



关于苏共败亡的几点思考 (2)

刘靖北

2010-2-4 14:21:31

来源： [人民网-理论频道](#)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关于苏共败亡的几点思考(2)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苏共败亡的教训

“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表现为走了一条粗放发展的道路。长期以来，苏联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不得不靠不断地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走粗放发展的道路。苏联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国家预算的50%左右。苏联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一直到1991年底解体，苏联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长期实行粗放发展方式直接导致了苏联经济速度递减，素质低下和缺乏竞争力。

苏共长期以来奉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严重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终于导致苏联经济在速度和效率方面都出现了危机。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人民心目中大打折扣，形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苏共和苏联社会制度的信任危机。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政权难以为继，人们作出了另外一种选择。

二、苏共党内长期以来严重的教条主义，在苏联形成了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背离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苏共败亡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因。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做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继承本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成分，借鉴吸收一切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反映时代水平的科学技术，培养塑造人民的创新精神。苏共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同时，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但是，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共党内逐渐出现教条主义倾向，而且日益严重。在列宁之后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为名，利用其对列宁主义解释权的垄断地位，泛化、神化列宁主义，致使其严重教条化。在发展列宁主义的旗号下，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论著中，建立了官方的不可置疑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在斯大林默许下，苏联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把斯大林神化的新造神运动。从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风靡全国，愈演愈烈。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结合起来，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

理论成了一切思想的源泉，斯大林的讲话成了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开始，教条主义成为苏共身上的一种积习和痼疾，长期伴随着苏共的决策者们。有关“产品经济思想”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有学者分析，从1931年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保留商品货币开始，在承认商品经济的历程中，大约每10—20年前进一小步。及至戈尔巴乔夫承认计划—市场经济，时间已经耗去了几乎整整60年！“本本”观念是何等的顽固！？

在苏共教条主义的浓厚氛围下，苏联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这一打着浓重斯大林印记的思想文化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把苏联最高领导人树立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后仲裁者。例如，1927——1929年政治经济学领域两大学派就该学科对象等一系列纯学术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1930年2月9日，斯大林对这一争论作出结论，说什么争论双方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他们的争论“当然是合乎敌入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再如，战后苏联语言学界就语言是否属于上层建筑和具有阶级性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样一场纯学术争论，最后也是由斯大林出面，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作出结论，认为：语言不是基础的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

第二、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以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干预思想文化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亲自发动和组织了一系列学术领域的大批判，例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哲学领域开展的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在生物学领域开展的对魏斯曼学派的批判等等。在开展大批判的同时，苏联也开展了对“旧专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清查和大整肃。1928年到1931年，苏联破获了所谓“沙赫特”案件，“拯救乌克兰联盟”案、“劳动农民党”案，“工业党”案以及“孟什维克联盟局”案等。每一个案件都牵连了一批知识分子，一大批著名学者、教授和技术专家遭到清洗。

第三、以思想文化的单一性取代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代替各种风格的自由竞争。例如，1948年，苏联生物学界拥护米丘林学说和主张摩尔根学说的科研人员就遗传学问题展开争论。结果，摩尔根学派被宣布为“唯心主义的反动科学”而遭到封杀，遗传学被当作伪科学遭到禁止。进而，苏联官方规定解剖学、微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必须以米丘林学说为基础。这样以来，在苏联生物学界就形成了米丘林学说一花独放的局面。再如，从1932年4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开始到30年代末，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而官方建立的文化和学术团体也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各种风格和流派自由竞争的局面不复存在。

第四、全盘否定除社会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一切文化成果，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批判，又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在很长时期里，苏联对本国的精神文化遗产采取了一律否定和强行禁止的态度。例如，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把200多名学术界著名人士强行移送出国，把他们的作品列为“禁书”而全面封杀。在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问题上，苏共长期缺乏全面正确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已陷于全面的危机之中，对其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一概加以排斥。这种在“纯社会主义”环境中培养社会主义意识的做法，不但没能培养出纯社会主义思想，反而使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掺杂在一起而遭到扭曲；不但没有杜绝资产阶级思想，反而导致了人们对国外资本主义文化的盲目崇拜。

